我国学者研发抗癌新药，可100%杀死肺癌等再生细胞

有望从根本上提高恶性肿瘤转移治愈率

本报武汉4月20日专电 （通讯员**韦富香** 驻鄂记者**钱忠军**）华中科技大学汪宁教授团队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俞飚研究员团队，共同合成并筛查了一种对恶性肿瘤再生细胞增生和转移具有特别疗效的新型精准靶向分子药物，可100%杀死乳癌、肺癌等再生细胞，未来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癌症的治愈率。近日，国际权威杂志《自然·通讯》介绍了这项医学研究成果。

癌症患者因癌细胞转移和扩散而致命，但如何抑制癌细胞转移或控制已经转移并扩散的癌细胞是至今仍然无法解决的难题。

华中大汪宁团队和黄波教授团队共同开发出筛查癌转移的原凶——恶性肿瘤再生细胞（即肿瘤干细胞）的新方法，这项成果于2012年发表于国际权威杂志《自然·材料》。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高转移的癌细胞具有极强的抗药性，而市场上现有的治癌药物无法杀死这些恶性肿瘤再生细胞。自2014年起，汪宁团队和俞飚团队合作，合成并筛查了一种对恶性肿瘤再生细胞增生和转移具有特别疗效的新型精准靶向分子药物。

在题为《抑制肿瘤干细胞的新药物》的论文中，研究人员以肿瘤细胞的视黄酸受体为靶点，通过最新的化学合成方法，研发出WYC-209。

研究人员发现，WYC-209在低浓度情况下就可以100%地杀死肺癌、乳腺癌、卵巢癌、黑色素瘤等恶性肿瘤再生细胞并抑制这些恶性肿瘤干细胞的增生。通过小鼠实验，研究人员发现该药物可以杀死已经转移的癌细胞并抑制癌转移，有效率接近90%。

据介绍，WYC-209不仅明显优于国内外市场上的化疗和靶向治癌药物，而且更重要的是，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都表明WYC-209没有毒副作用。

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了该药物的作用机理，他们发现该药物是通过半胱氨酸蛋白酶-3信号通路来诱导癌细胞凋亡。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与华中大已经共同申请了中国专利及国际专利。如果WYC-209将来通过临床试验，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恶性肿瘤转移的治愈率。

廖仲恺：一门忠烈扶助农工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号夷白，字仲恺，广东省惠阳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

1903年，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两人在日本东京结识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从此坚定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洪流。

1905年，廖仲恺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副部长。两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集会场所。

1922年8月，孙中山先后会见了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和苏俄使节越飞的代表，决心联俄联共，接受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廖仲恺两次奉命前往日本与越飞会谈，在国民党改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3年2月，在孙中山返回广州复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后，廖仲恺先后担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要职，全力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后，廖仲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党部工人部部长和农民部部长，2月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廖仲恺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忠实执行“扶助农工”政策，积极支持工农运动。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坚定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维护国共团结和国民党的革命方向，成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和旗帜。他也因此被国民党右派视为夺取党权、拆散国共合作的重大障碍。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前往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途中，被国民党右派豢养的暴徒刺杀于中央党部楼前。9月1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广州的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20多万人前往悼念。

壮志未酬身先死，廖仲恺以他的壮年生命，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周恩来曾赞誉他是国民党之重心、“工农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高度评价他“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的崇高革命精神。

在廖仲恺的革命生涯中，何香凝始终给予其坚定的支持。她曾作《赠别》诗为丈夫壮行：“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廖仲恺遇害后，何香凝强忍悲痛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而继续奋斗。

在父母的教育和熏陶下，廖承志和廖梦醒在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廖承志参加过长征，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次身陷囹圄而矢志不渝，逐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梦醒从抗战时期起担任宋庆龄的秘书，长期战斗在特殊战线上。

今天，当我们回溯历史，依然会被这一门忠烈前仆后继、向死而生的爱国情怀和事迹所打动。

新华社记者 **刘白云**

（据新华社广州4月20日电）

成都市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首次发现双连耳杯

船棺“棺王”墓主是成年女性

■本报记者 **付鑫鑫**

四川大学考古系原海兵博士日前公布，成都市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中，154号墓的船棺距今有2000多年。在研究了目前能找到的墓主人残留的几十片骨骼后发现：从股骨、盆骨等特征来看，更倾向于是位女性墓主；从牙齿的磨损来看，应为35到40岁的成年女性，身高约1.6米。

上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吊运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中最大的一座船棺墓（编号：M154）的船棺时，发现了船棺底部中间位置有腰坑。腰坑出土的6件青铜器（钺、鼎、匜、盆、鬲、甗）、2件彩绘木器第一时间送到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为此，中心主任、研究馆员肖崎牵头成立了M154出土文物抢救性保护项目组，对出土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

由于腰坑处于相对密闭的环境中，6件青铜器中除一件甗破碎数块外，整体保存状况较好，铜缶、铜匜还保有金属光泽。青铜器出土后环境骤变，若不及时处理会继续锈蚀，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有效保护文物？记者采访了中心助理馆员蒋璐蔓。她介绍，出土青铜器的保护包括缓蚀、封护等步骤，不同合金成分、不同保存现况的器物需“量体裁衣”。“我们对腰坑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进行无损检测发现，不同器物间的合金成分差别很大。所以，将根据器物的合金成分、制作方法制作相应的模拟样品，使用不同的保护技术试验，以挑选出最适合每个器物的保护方法。”

2017年至201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发现了近200座春秋战国船棺墓葬群，这是近年来成都平原古蜀考古的重要发现。其中，M154墓坑深约2.3米，船棺长约6.1米、宽约1米，棺内出土器物数量最多、等级最高，俗称“棺王”。M154棺内出土了数量众多漆木器残片，经初步室内整理，主要器型包括耳杯、双连耳杯、漆豆、漆盒等。目前，项目组已初步完成表面清洗和初步整理，后续需要编制保护修复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进行脱水保护与后期修复。乐观估计，5年内可以完成M154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馆员杨弢透露，M154出土漆床的形制、纹饰与商业街船棺葬A型漆床极为接近，但是前者工艺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雕刻工艺的广泛应用，类似的工艺在人们熟悉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也有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已经公布的考古发掘资料，双连耳杯这一器型是首次发现。合卺，是中国古代婚礼仪式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程序，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将其作为结婚的代称。《礼记·昏义》：“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合卺杯是新人共饮合欢酒的专用杯子，形制以双连的居多，推测此次出土的双连耳杯也具有类似功能。

汪洋主持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把双周协商座谈会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2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委员与中央有关部门定期交流的重要协商平台，是委员建言资政的重要履职方式。要继承以往座谈会的有益经验，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不断提高座谈会的质量、水平和实效，更好发挥政协协商民主的优势和作用。

本次座谈会的主题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对策”。与会委员、专家学者结合自身实践，从宏观态势、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以及法规伦理和社会关切等方面谈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看法，提出了意见建议。委员们认为，人工智能是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社会建设的新机遇。经过多年的持续积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创新创业活跃，部分领域核心技术实现重要突破，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重大原创成果不够多，相关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标准体系有待完善。

韩正在财政部调研时强调

更好发挥财政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记者**韩洁**）1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财政部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部署下一阶段财政工作。韩正重点调研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国库集中支付运行和监控、中央财政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方面工作情况，走进部分司局和处室，看望干部职工并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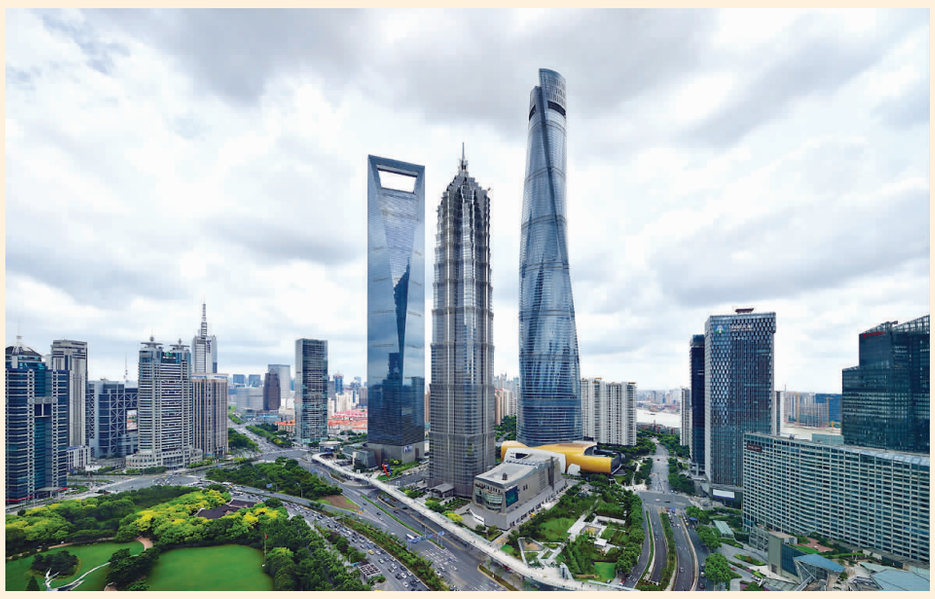
韩正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承担着重要职责。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抓紧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加快预算支出执行进度，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强化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投入保障，加强资金使用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保基本、兜底线，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要直面问题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一些重大问题研究透彻，确保决策科学、执行有效。

谋划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浦东实践”

——市政协常委会议专题协商议政纪实

28年前，说起浦东，虽与繁华外滩一江之隔，却是农田遍地，在上海人口中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俗话；上世纪90年代初，开发浦东的动员令响起，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片热土上，先后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出口加工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系列的“全国第一”，使得浦东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如今的浦东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着眼于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目标定位，依托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必须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如果说，当年开发开放浦东是中国显示改革决心打出的一张王牌，那么，随着改革进入攻坚区，现在的浦东更需要找到解锁高质量发展之道的秘钥。

3月末，在十三届市政协的首场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上，围绕“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进浦东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议题，政协委员们踊跃议政建言。能否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如何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在前期深入浦东新区各园区、企业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委员们纷纷亮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如今的浦东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着眼于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目标定位，依托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必须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

图片 视觉中国

迎难而上 惟有解放思想

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就需要客观理性地找差距，正视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浦东扩大开放的领先度在减弱、企业获得感不够强、人才政策供给跟不上人才实际需求”，代表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作重点发言的徐建民常委，将在前期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盘托出，这些问题也是开发区和企业普遍关注的。据徐建民常委介绍，在走访中，有外资企业反映，目前负面清单虽经过几轮缩减还是较长，与国际惯例相比仍有差距；有企业反映，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工商变更流程和时间并没有同步调整到位，尤其对创新型科技企业需要密集融资、频繁变更股权带来不便，部分政务服务在线化、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还有企业反映，海外人才生活工作在浦东不同程度地面临居住、出行、就学、就医、收入汇兑以及证件办理等方面的困难，而在国内人才引进方面，上海的人才落户打分和住房政策不能较好体现产业和企业发展需求。蔡友铭常委还指出，浦东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依然存在，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碎片化”情况突出，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用地缺乏有效的规划引导，项目落地与空间实际情况不相匹配，农村重复建设、无序建设影响了集聚效应的发挥。

改革进入深水区，新的难题摆到了面前。28年前的经验证明，要开拓新路，必须“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在马驰常委看来，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端赖于解放思想，如今站在更高起点的浦东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动力从何而来？惟有解放思想。浦东开发开放本身就肩负着突破旧体制、构建新体制的使命，浦东率先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率先在金融等领域突破传统体制障碍，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离不开决策者的智慧、勇气和决心，更离不开解放思想。马驰常委强调，要从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敢闯敢试的勇气和信心，抛弃满足于不犯错误、求稳怕变的守成意识，在改革体制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和增强开放信心等方面大胆作为。徐建民常委建议，要找准着力点，遵循“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要求，在推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进政府管理流程再造，优化符合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完善人才服务体系等领域有所革新和突破。

激发动能 机遇大于挑战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举办、自由贸易港建设呼之欲出、金融航运功能势头看好，这些都为浦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委员们认为，今天的浦东要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机遇大于挑战。

今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决策。董卫民常委认为，浦东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有优势，应主动探索解决博览会带来的产品和服务“进得来”、“进得快”和“从上海进来”等问题，加强有效制度供给，进一步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他建议，在产品和服务进口方面，要继续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降低口岸费用，压缩口岸耗时，让目标产品更愿意从上海进来；充分利用展会契机，把符合浦东产业发展方向和科创发展需要的高端企业、生产线、研发中心等引进来、留下来，通过导入高端优质企业，倒逼区内企业在竞争和交流中加强创新驱动，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在更高层次上打造众创城市空间。“进口博览会还能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找到更好契合点”，董卫民常委提议，要引导、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到展会上找商机、找合作、找渠道，增强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对此，李昕欣常委持有同感，他举例说道，当前在非洲手机市场占有第一位市场份额的是来自中国的手机厂商，原因是该厂商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的功能手机更好迎合了当地用户需求。由此，李昕欣常委想到，开放标准的设定应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更有利于主动参与当地新兴市场的规则建立。

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蓄势待发。长期在保税区一线工作的施惠良常委，深谙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中的优势和不足。他认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应当在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方面作深度拓展，确立“境内关外”的离岸地位是核心和关键。“要让自贸港真正成为离国际市场最近的中国市场、离中国市场最近的国际市场”，施惠良常委建议，要在制度上赋予自贸港“境内关外”的法律地位，着力落实一线放开，使国际货物入区实现不统计、不报关、不核查、不纳税，体现自贸港“境内关外”的本质特征。同时，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机场的航线优势，借自贸港建设的东风，大力发展国际中转、中转集拼业务并实现产业化，实现上海港和浦东机场由世界大港向世界强港、枢纽港的跨越。

浦东承载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功能。在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方面，蒋颖常委建议，积极探索对金融服务业领域有序放开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试点由外商独资与合资发起设立的银行卡清算支付机构，鼓励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建立综合交易平台；推进针对金融领域的税制优化，对现行税制中阻碍资本流动的不利税收因素进行梳理，研究实施促进国际金融活动的税收优惠和激励措施，促进跨境金融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而在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港方面，马须伦常委建议，加快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机场群与城市群联动发展，逐步构建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上海市区、长三角区域之间的快速交通集疏运体系。

引凤来栖 优化营商环境

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上海的目标是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行政效率最高、服务管理最规范、法治体系最完善的城市。聚焦营商环境，委员们的建言反复提及两个关键词：一是服务，二是人才。

屠海鸣常委认为，政府服务要让群众、企业感受获得感，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效果导向。在他看来，问题导向就是聚焦群众办事的难点、企业发展的痛点和社会反映的重点，需求导向就是搞清楚政策措施是否与企业需求对得上号，效果导向就是要让企业真满意，而不是被满意。他建议，完善部门协作机制，确保各涉事部门对“共管地段”和“真空地带”齐抓共管，提供无缝隙服务。对此，卢慧文常委给予呼应，“现在市民中心的集中审批形式，在物理空间上做到了‘只进一扇门’，但若业务涉及跨部门协调，‘最多跑一次’尚不能实现”，卢慧文常委指出，把各部门的事前审批集中放到市民中心窗口办理之后，优点是规范流程、提高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出现窗口人员业务不熟悉的情况，办理涉及多部门的审批和登记，有时还需要多跑几次才能搞清流程。她建议，在市民中心增加“综合咨询柜台”，坐诊跨部门“疑难杂症”，尽量消除因搞不清流程无功而返的窘境。王国平常委也认为，政府办事效率好坏最能在窗口形象上得以体现，在突出智能型政府服务的同时，窗口服务的态度和能力也需要重视和加强。

不少委员还在如何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话题上产生了共鸣。

谈剑锋常委坦言，在目前的人才打分体系中，市场发现、市场评价、市场认可的引才机制未得到充分发挥。比如，一些工匠型人才并非是专业院校出身，如果单凭“给人打分”的评价标准，这部分优秀人才很可能被拒之门外。他建议，兼顾对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的不同需求，探索将“给人打分”的方式转变成“给企业打分”与“给人打分”相结合的综合打分方式。“综合考虑企业的影响力、发展潜力、社会贡献率等要素进行打分，分数达标的企业可以获得人才落户推荐权，由企业自主推荐，将主导权分配给真正有助于企业发展的优秀人才”，谈剑锋常委如是说。

扶持留学回国人才创业，赵丹妮常委的建议是筑巢引凤，围绕重点产业的新一轮发展，增强对创业园及人才团队的投入和建设力度，推动留学回国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及示范建设，在自贸区、张江等区域强化创新创业促进机制，提升众创空间功能，为留学回国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工作生活空间。

在培养高端专业人才方面，倪闽景常委提议，浦东要抓住张江科技城转型升级和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性布局的机遇，谋划建设世界知名高校科技类研究生院集聚区，吸引最优秀的高校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和共建科创中心，为上海成为国际学生留学目的地城市打好基础。在张毅委员看来，法律服务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承担重要角色，他建议，研究制定上海律师业国际化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培养高水平国际化律师，落实本土律所聘用外国法律顾问政策，并对国际化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在税收优惠、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特殊的倾斜政策。